

21世纪中国 经典散文

历史记忆

林 非 王兆胜 李晓虹 选编

(上)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21世纪中国 经典散文

历史记忆

林 非 王兆胜 李晓虹 选编

(上)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记忆/林非, 李晓虹, 王兆胜选编. —呼伦贝尔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10.3

(21 世纪中国经典散文)

ISBN 978 - 7 - 80675 - 553 - 2

I. 历… II. ①林…②李…③王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4870 号

21 世纪中国经典散文

历史记忆

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

发 行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社 址: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
网 址: WWW.SHUSHANG.COM 邮 编: 021008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王瑞林
开 本: 720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: 25
字 数: 300 千字
印 次: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675 - 553 - 2
定 价: 49.80 元 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 言

对于中国散文而言，“五四”是一个分界点，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，于是数千年的散文有了一个质的根本性的跨越。就中国现代散文来说，九十年代是一个突变期，即由比较简短集中的散文转向长篇大论，于是散文越来越走向变体。可以说，“放”是中国现代散文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最突出的特征。

这种突破原来散文格局的努力是有意义的，它在知识含量、质地、长度、宽度和厚度上都有了一种别样的风采，这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尤其突出。不过，另一方面，散文的“破体”也出现了失控和失度的危险，这主要表现在知识撑破散文的肚皮、理性和思想过于裸露、结构松散蔓延、文大于质等方面。换言之，散文处于一个如何发展的十字路口。

新世纪中国散文在发生悄然的变化，尽管这种变化远没有九十年代散文变动的暴风骤雨，但其深刻的力量却是不容置疑的。一方面，散文仍然保持着九十代的“破体”之势，另一方面，一种纠偏“破体”神话的努力渐已成势。比如，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补其缺失，于是真诚散文、性灵散文开始引人注目！在结构上，那种假大空的所谓“大文化散文”越来越少，散文的适度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。还有，智慧式的散文为人青睐，人们开始对“好”散文投诸更多的热情，而不是被一些虚浮夸饰所左右。另外，新媒体散文在新世纪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，它以快捷、简凝、尖锐与新潮成为散文的一支新生力量，值得人们加以注意。

新世纪中国散文最有价值的还是在整合中的创新意识，这就是在传统与现代、破体与节制、本体与借鉴、思想与艺术等的关系中，进行



一种融通与创造。这样，散文就由一元走向多元，由偏极走向融合，由激烈走向和合，由外在走向心灵，即一种化合与新生的努力。因为散文的本性就是自然与平和，是平常心和人生智慧的展现。

当然，新世纪中国散文在获得了它的成就时也潜伏着危机。一方面表现为过于急切的追赶时代之风。散文作为边缘文体、心灵文体、平淡文体，它不可能总是领时代潮流，过分地追赶潮流必然会丧失散文的本性。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无条件认同。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传统，就很容易被传统同化，丧失现代性的品格，其视野、内质、境界和品位，都将受到限制。因此，散文在调整的过程中，还是要有世界眼光，对中西文化思想进行整合，在以往散文的经验中进行创新。尤其值得强调的是，散文家必须有天地情怀和人类的视域，并进行人格、心灵、精神的自我锻造。这样，散文才能找回自己，获得真正意义的超越性意向。

编者

2007年8月

目 录

序 言

编 者 / 001

追怀冼星海

何满子 / 001

黄裳浅识

黄永玉 / 008

又到甲申

袁 鹰 / 012

萨特：拒绝诺贝尔文学奖

林 非 / 019

朱皇帝点滴

李国文 / 024

黄秋耘相信眼泪

阎 纲 / 027

隐隐青山见故乡

周 明 / 033

梦中的图腾

从维熙 / 039

劝君王饮酒听虞歌

石 英 / 042

他这一辈子

王充闾 / 044

幽默是一种境界

张恩和 / 058

秋草独寻人去后

李元洛 / 063

敏感地带

肖 凤 / 070

谁免余情绕

范 曾 / 075

曼殊终归是何人

杨羽仪 / 077

托尔斯泰长眠之地

朱增泉 / 083

历史的乡野

周同宾 / 085

最后的梵高

冯骥才 / 096

眷念皇帝

田中禾 / 106

历史
史
记
忆

001

静影沉璧	杨闻宇 / 110
独秀的另类“文存”	卞毓方 / 114
读圣经札记	周国平 / 127
船娘和歌	郭保林 / 132
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	梁 衡 / 136
巴老和一个世纪	余秋雨 / 143
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	韩石山 / 149
泰姬陵不是悲剧	李存修 / 160
缠绵悱恻属沈园	王本道 / 165
历史不忍细看	黄文山 / 169
伶 魂	乔忠延 / 172
秋华与冬雪	张承志 / 180
唐朝，那朵自由之花	李木生 / 186
担当，担当人生	刘长春 / 195
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	刘家科 / 200
上下五千年	莫 言 / 207
草原长调	韩少功 / 210
感念祖先	李汉荣 / 218
百年钟声	彭雪开 / 225
把自己交给道路	高建群 / 227
向往平民	郭翠华 / 232
告别唐宫	赵 玫 / 235
人 牲	筱 敏 / 239
轻伤的人，重伤的城市	翟永明 / 245
笔擎千秋（节选）	张加强 / 250
瞬间的永久	南 帆 / 260
怀念孙犁先生	铁 凝 / 268
书架上的战争	朱大可 / 274
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	朱 鸿 / 280

不到长城
萧红，我的姐妹
迁徙的跫音
英雄的末路
永远的花儿
一路仰望
王安石之死
1992年的暴力
鲁镇的黑夜与白天
蒙古长调
云水生涯
圆明园
像秋冬的黄叶一样飘零
春天里的轻舞飞扬
昭君的草原
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
关于票证的记忆

陈启文 / 287
辛 茜 / 290
熊育群 / 294
张清华 / 301
马步升 / 306
王 族 / 312
冯伟林 / 320
桑 麻 / 335
迟子建 / 340
巴音博罗 / 345
王开林 / 351
洪 烛 / 359
凌 鹰 / 362
苏沧桑 / 367
庞天舒 / 371
王开岭 / 376
周晓枫 / 382

追怀冼星海

◎何满子

主张人生就是选择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在某处说过：记忆也是一种选择，当人遇到某种情景，某种刺激，便会从现实选择既往，想起某些人，某些事（大意）。确实如此。面对当前文化市场的浮器，黄钟歇响瓦釜齐鸣的可悲现象，常令人兴起正不胜邪之慨。于是，我脑里每每闪亮出旧时交往中一些对艺术持虔敬态度的人物形象。在音乐家中有马思聪和冼星海。马思聪在日常细微处透露出来的对音乐的敬业精神所给我的启发，前些年我曾几次撰文提到；这回，乘冼星海逝世六十周年之机，来追述一下这位人民音乐家。

我和星海的交往从1937年8月在上海初见至1938年12月延安分别止，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但他曾向我倾谈过他的生平，特别是巴黎留学时期的传奇性的遭遇，以至我能就他的诉说以及与他交往中亲切的认知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电影文学本《冼星海传》——这剧本经过一番周折未能摄制，终于在“文革”中被抄没，下文我将叙及。

初次会见的日期很好记，那是“八·一三”淞沪战争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三天。我于淞沪战争爆发的次日由杭州到达上海；第二天会见钱韵玲，即后来的星海夫人；次日是由她带我去访问星海的。钱韵玲是我姐姐晓梅烈士在杭州黄河桥小学教书时的同事，钱的父亲就是淞沪战争时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，著名的理论家钱亦石。不久我就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。

冼星海当时住在拉都路（今襄阳南路）一条弄堂里一间石库门楼

房的二楼。住着一间大约十五平米大小的房间，没有什么陈设。我们去的时候房里有几位来客，是《大众歌声》杂志的编辑，向星海索取他前些日子谱写的《青年进行曲》去发表的。这支开头几句是“前进，中国的青年/挺进，中国的青年/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/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/将一切力量/争取胜利的明天……”的歌曲在抗战前期十分风行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星海正在将原来的五线谱改写简谱。星海没有钢琴，写完后用小提琴来试音校订——这把小提琴是离开巴黎回国前他的一位老师送给他的，我在《冼星海传》中叙述了送琴的故事。

星海拉琴试曲的模样，因为后来也见过几次，所以印象十分深刻。他一面拉琴，一面侧着头轻声哼唱，有时高举着弓，作短暂的沉思，再拉，再哼，最后放下琴，双手握拳使劲向上一击，满意地喊：“行了！”

可惜我和星海交往时，对音乐还是门外汉；不能像上世纪四十年代接触马思聪时那样，我已“恶补”过音乐知识，认真地读过了旋律学、和声学、曲式学、配器法等几乎涵盖了音乐学说理论作曲系的全部课程，得以藉专业知识和对方作深一层的交流。因此，我对星海的音乐风格不能像对马思聪的作品那样把握得较深，好在那时星海创作的大都是声乐曲，一切都很显露，他要直到去延安后才写器乐曲，大型的交响乐之类我都没有见到过谱，更没有听过乐队演奏。

第一次会见后，我曾写了一篇《冼星海印象》的短文，在《大晚报》上刊出。因为钱韵玲跟着我姐管我叫“小弟”，星海也跟钱韵玲喊我“小弟”，故而我那篇文章也署名“小弟”。文章刊出时我已参加战地服务团，在浦东南汇县的周浦镇工作。我曾带了报纸过江到上海再访星海。战时大家都很紧张，匆匆谈了片刻就握别，直到次年才在武汉重晤。

1938年3月，我从上海淞沪战地撤退，辗转流亡到了武汉。星海随着洪深带队的演剧二队，经苏州、南京、徐州、开封、洛阳，沿途进行抗日宣传，星海曾深入工厂农村，教群众唱救亡歌曲，不像我这样纯是逃难，他是如他所说的“一路战斗”也到了武汉。果然，他的本来不白净的面色更加黝黑了，可谓一路风尘仆仆。他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，仍然经常奔走于武汉周遭的厂矿、农村和部队驻地教

歌、指挥群众演唱和作救亡宣传。我在汉口的《大汉晚报》当编辑兼跑新闻，只要星海在武汉，我便过江到武昌县华林他的宿舍去串门。在战时流亡的特殊环境中，有如患难之交一样，人们的感情格外易于融洽，我们称得上是知交了。虽然他比我大十多岁，却无话不谈，连他在三厅和另一位音乐家张曙吵架的私事，也愤愤地向我诉说。他本来是个木讷寡言的人，但一喝点酒话就多起来了。他喜欢喝两盅，但没有瘾，酒量也远不及我。两盅下肚，就絮叨地向我摆谈各种往事，倾诉他的经历：幼年家境如何贫困，他的做女佣的母亲如何茹苦含辛地抚育他；母亲在澳门那家做女佣的主人，葡萄牙籍乐师如何诱发他走上音乐之路；如何冒险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专而又在一次学潮中被开除；如何在一艘外轮上做苦工而千难万险地到了法国，以及在巴黎学音乐的颠沛而又充满戏剧性的遭遇……我察觉他那时虽然热情昂扬地投入工作，但他是寂寞的，因此要找人诉说。他谈到音乐时便欢快起来，时不时夹哼着一段旋律。

他说，为了追求艺术，一切艰辛苦难都甘之如饴。“夯巴郎（粤语：一切）都难不倒我！”说时握拳望空一挥。这手势是他的习惯动作，令人联想到他的指挥手势。

我把听到的一切都记在日记上，部分还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。可惜这些日记和剪存的报刊都已在1955年被株连入胡风案时失去。

后来我也从马思聪处听到星海在巴黎的窘况。马思聪和星海的道路和艺术风格是两路，马思聪更学院派，星海则更民间派。但马思聪对星海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很佩服，在巴黎时曾去看过他。星海住在贫民窟的一座楼房里，最高一层的一间狭隘的小房间。这间顶楼小屋低矮得身子也不能伸直，连练琴也只得钻出小门到阳台上去练。马思聪摇头叹气道：“他就这样对着上帝练琴！”

一个令人万分激动故事每使我一想起来就歔歔不已，我在电影文学本《冼星海传》的八本戏中用了整整两本戏的篇幅写了这故事。

星海那时已经进了巴黎音乐学院，但必须靠打工维生。通常到旅法华人开的洗衣作之类的店家找工；有时找不到工打，就得去餐厅或酒吧卖艺赚几个法郎。他说，虽然巴黎街头也常有潦倒的乐师和画家卖艺乞讨，他总觉得很难为情。但迫于无奈，他说，他就集中精力拉曲子，

不朝人看，别的什么也不想，只当作是正规的练琴。一天，他走进一家相当豪华的餐厅，前一天音乐院的课正讲授马思南的音乐，他就向食客们演奏马思南的曲子。在餐厅用餐的有两个衣着时髦的中国留学生，显然是公费留学又有家庭汇款可供挥霍的纨绔子弟，认为中国人在饭店里卖艺乞讨是丢了中国人的面子，一个大声叱骂，一个竟站起来要斥逐冼星海出去。这时，一位绅士模样的法国食客挺身而出，向那两个中国学生发话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！这位青年音乐家全神贯注地演奏曲子，他的马思南拉得多动听啊！你们却要捣乱！这样不尊重人，不尊重艺术！”一顿训把那两个华侨学生训得龟孙子般地瘪了。这位绅士邀请冼星海为他演奏一曲自己认为演奏得最满意的曲子，冼星海聚精会神地拉了一曲克莱斯来的《中国花鼓》，绅士十分赞赏，丰厚地给予酬金。

就这样一次遭逢，星海后来成为这位绅士的家庭教师，教他的女儿学提琴。他的姓氏是 Mullier，名字我此刻记不真了，但他是巴黎第七大学的教授则不会记错。后来星海回国，也得到了教授的资助。直到在武汉时期，星海还和他通着信。

武汉当时热火朝天，星海成天忙于组织宣传抗日的群众歌咏活动，特别是那次庆祝台儿庄大捷的万人大合唱，星海兴奋地担任指挥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可没有人知道，那几天他正患着肩周炎，他是熬忍着臂疼上场的。钱韵玲告诉我，他老是嘀咕抱怨没时间作曲，一点静静的构思的时间也找不到。的确，在武汉他几乎没有创作过一支歌，直到去了延安，才爆发出积蓄已久的灵感。

这年的8月，我已决定赴延安。原定和星海夫妇商定一起走的，但我先办好手续，有伴就先走了，到延安是9月1日。星海和钱韵玲直到11月才到。而两个月后，我就读的陕北公学改组，校本部连同高级研究班一起并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陕公分校，地址在枸邑县的看花宫。我所属的高研班随着成仿吾校长一起离延安赴看花宫。我和星海夫妇在延安两个月的短暂聚会，也是最后的一次聚会结束。临别的前一天，钱韵玲煮了一只鸡，在桥儿沟鲁艺宿舍的窑洞里治餐为我送行。

此后的几年中，我在西南大后方，不断唱从延安传出来的星海的歌曲。《生产大合唱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在大后方也很风行。我为星海

的创作成果感到高兴。当时在中国大后方没有管弦乐队的条件下，根本没有创作大型器乐曲的可能，交响曲、协奏曲什么的即使写出来也没处演奏。CanTaTa 已是能尽情发挥的最大的曲式了，星海已发挥了最大的能量。

其时也听到一些从延安到大后方来的人传来的“小道”，说星海是“延安四大怪人”之一。“四大怪人”的其他三个是萧军、王实味、塞克。除了萧军之外，另两人我一无所知，猜想不出星海何以会和他们并列而称“怪人”。星海为人憨直、粗犷，个性很鲜明，有时难免得罪人，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能得“怪人”之名。幸亏他于 1940 年去苏联了，否则，我猜想不出在 1942 年整风和“抢救运动”时他将落入什么境地？我为他后怕。

他被派赴苏联的消息是我在 1941 年由成都赴湘桂途经重庆时听《新华日报》的熟人说的。苏联是音乐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，星海在那里必更能施展他的才能，我为他庆幸。

1945 年 8 月 15 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在那段悲喜交集的日子里，我回顾这艰苦的八年抗战，想到自己战时的历程，想到开头的淞沪战争，自然想到和星海的初逢……心想，我们定能在战后的上海重晤。如再见面，我如今有点资本可以和他较内行地交谈音乐了。没想到，冬天得知了他病逝于莫斯科的噩耗。我不胜哀伤，写了一道《洗星海悼歌》追悼他，词曲都在当年 12 月的《新华日报》副刊上刊出。没有人为星海开追悼会，这样的歌是没有人会唱的，我只是表示一点哀思而已。但据当时在贵阳工作的好友叶帆告诉我，那里有一家文艺刊物转载了这首悼歌。马思聪当时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，估计是由于他的关系。

我经常起意要为纪念星海写点什么，1953 年，几位朋友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，怂恿我写电影剧本，我决定写《洗星海传》。因为星海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是在巴黎，而我不熟悉那里的风光，于是决定求助于马思聪。我写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提纲，并连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，写信给那时正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。马思聪很认真地回了我一封长信，逐条回答了我的提问，连巴黎街道原名、位置也写得很详细。又在剧本提纲上提注上许多意见，给我帮助很大。这个文学本于

1953 年底完稿，送交给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审核。可是直拖到次年夏天，仍无回音。我很懊恼，便写了一封颇为发牢骚的信给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所长夏衍。夏公没有回信，但他显然干预了这事，剧本很快退回，附了一封简短的信。大意说，这剧本的许多情节发生在法国，没有条件出国去拍外景。云云。这话也是事实，当时是锁国政策，不像改革开放以后那样可以方便地出国摄制，我只得搁着。1955 年，我莫名其妙地被株连入胡风案，凡是有文字的纸片全被当做罪证搜查了去。1956 年出狱后，经过我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石西民申诉（石西民 1945 年时任重庆《新华日报》的编辑主任，他对我在该报刊出的《洗星海悼歌》还保有印象），才由公安局发还。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月半，“文革”抄家，这本命运多舛的剧本就永不复返了。

星海去世后，我一直打听钱韵玲的下落，想从她得知星海最后一段生活情况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才从在浙江美术学院任教的老友卢鸿基那里得悉她已另组家庭，定居杭州。我想去访见她，但鸿基示意“不宜”，可是他大概将我寻访她的事告诉了钱韵玲，不久星海的女儿洗妮娜来上海探访过我一次。她是为了广州要给星海建立塑像来征求我的造型意见的。我总算见到了星海的后人，那长相酷肖其父的故人之女。我和星海交往的这段因缘就从此了结。

洗星海是我所认识的最勤奋的艺术家，他几乎全身心地生活在音乐里，随时在生活中捕捉乐思，从一切音响中捕捉旋律。给我印象极深的是，在武汉一次过江轮渡上，船快到码头上，我们要起身出舱的刹那，船舷上忽然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叫卖声，他马上喊道：“等一等。”掏出一个本子，拔出自来水笔记上了一些符号，肯定是他从那女孩的叫声中获得了灵感。这种不择时地的素材积储，使他作曲十分快捷，据说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写成只用了三四天的时间，可谓神速。

星海出身穷苦，成长的道路中充满坎坷和挫折，且常和下层群众相伴，所以怀有平民情结，执著地将艺术献给苦难的群众。他非常佩服聂耳，我多次听见他对聂耳的赞扬，但也很率直地谈到聂耳的曲子在技巧上的不成熟甚至疏失。我记得很实的是，他有次谈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即现在的国歌，说有一处显然的败笔，就是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

险的时候”一句，在“到了”之后，用了半拍休止，便把一个完整的句子切断了。星海并拿黄自的合唱曲《抗敌歌》作比较，说黄自的曲子多么严密工整，合唱之中有一句齐唱，棒极了。说黄自的曲子横看竖看（指旋律与和声）都精彩。但从倾向说，星海还是赞赏聂耳，给他们定位是黄自是爱国音乐家，聂耳是群众音乐家。我以为这见解极是。在星海眼里，“群众”更为可贵，是和他本人血肉相连的劳动大众。星海自己也正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。



黄裳浅识

◎黄永玉

黄裳生于1919年，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，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，“生和死，这真是个问题！”哈姆雷特这样说；“剥削和被剥削”，十月革命这样说。黄裳比中国共产党年长两岁，他是奉陪着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。

黄裳是山东益都人，一般地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，大概自小起始于《水浒传》吧！怎么第一次见面已经记不清了，时间在1946年底或1947年初，《文汇报》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，若是在编辑部，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。八张或十张写字台，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，有陈钦源、叶冈的座位，他们是在一排。杨重野、杨卓之诸君好像在另一个房间。

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，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。钦源是广东人，我们多有一些话说，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，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，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，楼上有讲究的货架，放满一盒盒的雪茄。

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，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，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，黄裳兄的母亲，苗子兄的母亲和郎风老大姐的妈。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（我叫姑公姑婆），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。近处讲，见过汪曾祺的父亲，戴金丝边眼镜笑眯眯的中年人。说这些干什么呢？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。

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区立中学教书，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

教书，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，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。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，很有点派头，一见柜台外站着我们两人，关了抽屉，招呼也不用打昂然而出，和我们就走了。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，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，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。我看也是。

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，星期天的一整天，那一年多时间，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。还有那活生生的钱！

我跟曾祺哪里有钱？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、坐出租车、电车、公共汽车，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。不是不想，不是视若无睹，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。几十年回忆起来，几乎如老酒一般，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。

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：给《文汇报》编副刊、中兴轮船公司高级干部、写文章、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、翻译威尔斯的《莫洛博士岛》（屠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是不是那时候？不清楚了）、出几本散文集。还有什么收入？伺候年老的妈妈，住房及水电杂费，收集古籍图书，好的纸、笔、墨、砚和印泥……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……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。

前些日子我到上海，问容仪：“你听过你爸爸开怀大笑过吗？”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。容仪说：“有吗？他有过大笑吗？”有的，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。在我的回忆中，黄裳的朗声大笑，是我友谊的珍藏。很可能，两位女儿呱呱坠地之后，那年月，黄裳没有空了。从历史角度看，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。

说一件有关笑的往事。又是一个可爱的星期六或星期天，好像吃过哪家馆子后，他和曾祺两个人喝得微醺，我走在离他们二十步远光景，观览着左右毫不相干的热闹，清醒地说，我们应该是从另一些马路拐到这条著名的马路上来的，叫做四马路，四马路有这个和那个，是我自小听老人摆龙门阵知道的。我不喝酒，却是让两位的酒气加上闷热的酒楼熏得满脸通红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斜刺里闪出两个婆姨，一人挟我一边手臂，口里嚷着：“先生帮帮忙好哦？先生帮帮忙好哦？”往弄堂里拖。挣扎了好一会，两位女士才松了手，这时我听到黄裳那放开喉咙的